

#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



2002  
新道理  
龙谦 胡庆嘉 编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主编

#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

桂林文史资料

第三十八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主编

龙谦 胡庆嘉 编著

漓江出版社

#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

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

龙 谦 胡庆嘉 编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529 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ISBN 7-5407-2377-7/G·800

定价: 30.00 元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物（部分）



胡愈之(1896~1986),抗战时期在桂林筹建文化供应社,任编辑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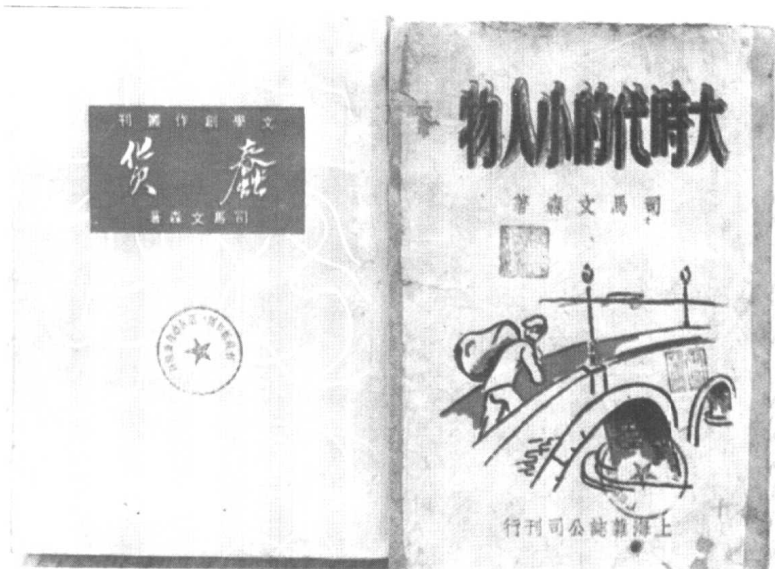
1942年3月,赵晓恩参加桂林文化供应社工作时与同人合影(坐三排左第二人邵峯麟,左三陈此生、左四陈劭先、左五李任仁;坐三排右第一人赵晓恩、右二杨承芳、右三宋云彬)。



生活书店桂林分店门市部



华应申（1911～1981），抗战时期在桂林任新知书店副总经理、中共桂林市书报业党总支副书记。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图书（部分）

# 目 录

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事业(代序).....	魏华龄(1)
出版大事记(1936年10月~1944年11月) .....	(9)
图书出版发行 .....	(71)
一、出版发行机构.....	(71)
二、出版发行图书.....	(75)
三、出版社、书店(书局)简介 .....	(88)
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图书出版发行机构一览表(一)	
.....	(129)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图书出版发行机构一览表(二)	
.....	(140)
四、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出版图书目录 .....	(148)
期刊出版.....	(341)
一、期刊发展情况 .....	(341)
二、主要期刊介绍 .....	(351)
附:出版期刊一览表 .....	(408)
书刊印刷.....	(439)
一、发展概况 .....	(439)
二、主要印刷厂简介 .....	(449)
附:抗战时期桂林印刷厂一览表 .....	(458)
编辑、出版家简介 .....	(465)
国民党政府对出版业的管理、控制、迫害与出版界的反控制、 反迫害斗争.....	(508)



一、国民党政府的出版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	(508)
二、国民党政府对出版事业的管理、控制与迫害 .....	(512)
三、出版界反控制、反迫害斗争 .....	(521)
附：抗战时期广西书刊审查机关送审被禁书目 .....	(529)
<b>回忆录选登</b> .....	(539)
革命队伍的一座熔炉	
——抗战时期的桂林新知书店 .....	沈毅然(539)
新知书店在桂林始末 .....	沈静芷(542)
龙隐岩畔一人家	
——散记新知书店总管理处 在桂林 .....	许  静(555)
皖南事变后的新知书店桂林办事处 .....	吴康宁(563)
忆桂林,怀“远方” .....	曹健飞(567)
透过灰色迷雾的阳光	
——实学书局概况 .....	蒋峰北  石立程等(572)
回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 .....	卞祖纪  邵公文(576)
生活书店门市工作的特色 .....	王仿子(582)
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二三事 .....	倪子明(592)
三家书店的反迫害对策 .....	华应申(603)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供应社始末 .....	赵晓恩(605)
<b>参考资料索引</b> .....	(619)
<b>编后话</b> .....	(628)

## 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事业(代序)

魏华龄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曾有“文化城”之称,而这个文化城的主要特点是以出版事业的发达为主要标志的。当时,“桂林是全国两大文化城之一,它拥有广大的出版机构,它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sup>①</sup>。抗战期间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80%是由它(按:指桂林)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sup>②</sup>。

在这一时期,集结在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著名的也不下一二百人,如郭沫若、张铁生、张友渔、张志让、张锡昌、姜君辰、千家驹、金仲华、曹伯韩,等等;出版工作者有胡愈之、范长江、徐雪寒、黎澍、宋云彬、傅彬然、赵晓恩、华应申、卞祖纪、孙明心、邵公文、朱执诚、曹健飞、贺尚华、沈静芷、胡仲持、陆联棠、赵家璧、张静庐,等等;作家有茅盾、巴金、夏衍、邵荃麟、胡风、司马文森、葛琴、聂绀弩、艾青、林林、周钢鸣、艾芜、王鲁彦、骆宾基、端木蕻良、王西彦、孟超、华嘉、黄药眠、林焕平、熊佛西、黄宁婴、陈残云、秦似,等等。他们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不但对于桂林,而且对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和出版事

---

① 司马文森:《扩大宣传周之后建议成立西南文抗》,1944年6月21日桂林《大公报》。

② 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1947年5月18日上海《大公报》。

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和出版社共 200 余家(当时出版社多自营发行),其中仅 1942 年“在桂林书业公会登记过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共有 79 家。抗战以来,一个城市的出版单位多至于此,大约还是第一次”<sup>①</sup>。当时桂西路两旁全是书店,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店街”。此外中南路、太平路、环湖北路也有不少书店。这些书店、出版社按性质来分,大体有四类:一类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以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有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读者书店等,对进步文化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广大知识青年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类虽不是党直接领导,但是以进步文化人为骨干,在党的影响下或有地下党员参加创办起来的(也有上海迁来的),如大公书店、石火出版社、白虹书店、文光书店、国光出版社、立体出版社、耕耘出版社、文献出版社、华华书店、文学编译社、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这些书店和出版社在一些进步文化人的支持下,出版了不少好书,对抗战和革命事业起了有益的作用;再一类是中间性的书店,它们一般只经营发行业务,本身很少出书,所出版的图书也多为课本、实用书以及古旧小说;第四类是由国民党、三青团以及一些反动文人所开办的,它们拥有的读者不多,门可罗雀。文化城出版事业的主导方面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文化城是以进步文化作为主要标志的。

由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印刷业也随之剧增。抗战初期,桂林有大小印刷厂不上 30 家,大部分属于手工印刷,没有专门印刷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 1943 年 7 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 109 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有 8 家,即秦记西南印刷厂、建设印刷厂、三户印刷厂、科学印刷厂、国光印刷厂、中新公司印刷厂、侨兴印刷厂、青年印刷厂等,其中党掌握的有西南、建设、三户 3 家;

---

<sup>①</sup> 秋旸:《桂林的出版事业》,1942 年 9 月 25 日重庆《新华日报》。

此外,还有书版兼彩印的6家,书版兼杂件的12家,彩印的5家,铸字的2家,专门装订的3家。每月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sup>①</sup>。印刷业的发展,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时,图书杂志报纸的出版空前繁荣,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出版了200多种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音乐、美术、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20种以上,刊物的普通销路约近1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7000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2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5000为单位”<sup>②</sup>。这个数字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很可观的。当时,“发行的网线,也遍及全国。以桂林为出发点沿湘桂、粤汉铁路可以销到长沙、曲江;从耒阳转交公路,可发至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利用西南公路,桂林的书先运到贵阳,再由贵阳分运昆明、重庆。重庆的市场可消化桂林书刊的半数,再由重庆西发成都,北发西安、兰州”。桂林除了印书纸张货源充足外,又是“西南公路铁路交通的中心,运输交通,迅速方便”<sup>③</sup>。这段记述,从地理方面说明了桂林出版发行事业发达的原因。与此同时,还有大小报纸10多家,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

战时桂林的出版物中,介绍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读物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抗战前期,由于广西的政治环境比较好,《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通过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以及生活、新知、读书三家出版机构大量发行。当时新知书店还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多种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桂林曾经大量翻印。还有一些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

---

① 沈文:《桂林市的印刷工业》,1943年9月《中国工业》第19期。

②③ 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1947年5月18日上海《大公报》。

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经济学》、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都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新中国学术丛书”等对青年读者有过启蒙的作用。据当时生活书店负责人卞祖纪回忆：1938年在广西大学任教授的李达还将他的著作《社会学大纲》一书作为教材，做到学生人手一册，“每逢星期日，我们店（按：指生活书店）则是广西大学、桂林高中等同学密集之地，他们专心致志选购图书的动人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后来武汉、广州沦陷，人流涌向桂林，我们店更是顾客盈门，络绎不绝。我们不但门市业务经久不衰，邮购业务也相应发展迅速，到1940年底，邮购读者达8000户左右。”<sup>①</sup>盛况空前。

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事业，特别是一些进步书店和出版社，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工作的。1938年3月，生活书店最早在桂林设立分店，这年的第四季度，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相继建立。1939年，又先后复刊了《救亡日报》，建立了读者书店、南方出版社和文化供应社。以上这些出版和发行机构，都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些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概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党组织领导。当时新华、新知、生活、读书四家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并建立了书报界党总支，沈毅然任总支书记。书报界的重大事宜，不但受到八办的关心，而且得到当时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经常指示。

文化供应社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1938年底，胡愈之奉南方局之命，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到桂林开展文化工作，他当时以救国会代表的身份，联系在桂林的救国会成员李任仁、陈劭先和陈此生等，他们是桂系当中的国民党左派，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对中共抱友好合作态度，与非中共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积极支持。因此，当胡愈之向他们倡议筹建文化供应社的方

---

<sup>①</sup> 卞祖纪、邵公文：《回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桂林文史资料》第8辑第54页。

案时，马上得到他们的赞同。文化供应社由胡愈之、陈劭先、陈此生负责筹备，只花了3个月时间，于1939年10月正式成立。董事长为李任仁担任，社长和秘书（相当于经理）分别由陈劭先和陈此生担任，编辑部主任是胡愈之，总揽编辑出版大权。据胡愈之后来说，“所用干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农同志推荐的”，“我当时的党籍绝对保密”，文化供应社“实际上是由八路军办事处领导的”<sup>①</sup>。1940年冬，胡愈之离桂后，李克农又指定张锡昌负责领导文化供应社的工作，与生活、新知、读书三家紧密配合，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特务横行，党的组织及其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许多进步文化活动和出版发行工作，从表面上看是一些非中共的文化人处于第一线，而实际上则是党在那里起作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发挥作用。

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了，《救亡日报》被迫停刊，生活、新知、读书三家门市部先后被迫停业，一些地下党员也被迫转移了，但是有些党员还在，党的出版发行工作还在继续。当时，周恩来在重庆约请三家书店的责任人共商对策，他提出要采取“化整为零，多种形式”的做法，将三家书店区分一、二、三线：第一线出版物要敢于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第二线着重出版理论性书籍以及同现实政治关系不那样直接的书籍；第三线出版工具书、技术性书籍和中外文学书籍，采取更为稳当、隐蔽的做法<sup>②</sup>。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派李亚群等到桂林建立了中兵桂林统战委员会，周恩来对李亚群说：“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广西同其他地方有差别，要充分利用这个差别，做好交朋友的工作。”<sup>③</sup>李亚群到桂林后，得到新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

- 
- ① 赵晓恩：《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文化供应社始末》，《桂林文史资料》第8辑，第193页。
  - ② 徐伯昕：《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集》，1984年6月出版，第103页。
  -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89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527页。

主任李济深的支持,工作逐步恢复。接着,成立了以邵荃麟为组长的文化工作组,成员有张锡昌、狄超白二人。在文化工作组的领导下,桂林的文化和出版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了。1942年出版的文艺刊物就有10种之多,比皖南事变前的1940年略少,但比重庆要多。大型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杂志》,就是1942年创刊,由邵荃麟负责主编的。这时,生活、新知、读书三家虽然是被迫停业了,在桂林的出版发行单位名录上已不再见,但是在出版发行阵地上,三家的出版物并没有因此消失,他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化整为零”,建立起二、三线书店。三家的工作人员除少数必须隐蔽和转移的以外,大部分仍然留在桂林继续战斗,只不过换了一个招牌,如生活书店除转移一部分人员和图书到三户图书社以外,同时又筹办起了学艺出版社和文学编辑社;同样,新知书店则把桂西路的门市部转让给文化供应社,由文化供应社把新知书店的图书发行任务承担下来,还有一部分干部也转入该社工作,另外又以远方书店和实学书局的名义在继续出版发行新书;读书出版社则换上了新光书店的招牌。留在桂林三家书店的地下党员又重新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他们又继续在传播着革命的火种,直到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

在湘桂大撤退前夕,书店和出版社如何部署撤退,党一直在关心着。当时,周恩来曾经明确指示:“兵分两路,到时候,一路从陆路向西撤,到重庆来赶热闹,要配备主力;另一路,从水路向东撤,那边是山地,地势很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也要配备主力,必要时,组织当地人民,干它一家伙……撤,就是要大家去撒革命文化的火种。”<sup>①</sup>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时,三家书店以及秦记西南印刷厂,还有文化供应社,就是按照周恩来关于书店疏散工作的指示去做的。在敌人入侵广西期间,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又在桂东的八步、昭平继续战斗。

此外,党也十分重视文化市场和出版工作中带倾向性的问题,只要问题出现,就及时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引导。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随着政治上出现了低潮,在文化出版方面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潮

---

<sup>①</sup> 沈静芷:《新知书店在桂林始末》,《桂林文史资料》第8辑,第77页。

时期,主要表现在1941年的文化运动不如1940年来得蓬勃和有生气,杂志刊物不少停刊,作品在量的方面大为减少,出书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文化工作组非常关注,曾由当时《文艺生活》杂志主编司马文森(党员作家)出面,以文艺生活社的名义,于1941年11月19日召开了“1941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目的是检讨过去,开创未来。出席座谈会的有田汉、邵荃麟、宋云彬、艾芜、杜宣等14人。经过座谈分析,大家明确了出现低潮的主客观原因,一致肯定虽然在1941年“整个文艺运动是低潮的,不过在低潮中也有发展,只是发展得不怎样平衡就是了”(司马文森在座谈会的总结);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在文艺运动方面应该注意的几点意见,明确了方向,振奋了精神,于是才出现了1942年文艺运动的新高潮。

在文艺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以至后来的日子里,“以渔利为目的的书商,重新侵入到文艺中来起支配作用。书刊出版,要商人确定标准,看是否可以从渔利。在文艺中市侩主义抬头了,他们所出的书不是为了整个文艺运动,而是为了他们的利益”<sup>①</sup>。“商业势力控制了文化生产,利润的追求成为文化生产事业的主要目标,出版界成为小市民低级欲求的尾巴,处处讲究‘生意经’,讲究迎合市民阶级读者的脾胃……市场的评价,掩盖了文化的评价。于是浅薄无聊的小册子和低级趣味的刊物到处风行,而学术巨著反因产销的困难而为出版商所冷视。即使比较有意义的书籍的出版,也大多陷于散漫无计划的状态。商业势力不仅支配了文化市场,并且也影响了文化人的创作活动,于是粗制滥造的风气渐渐养成,甚至有出版商出题目,作家写文章的怪现象。”<sup>②</sup>针对当时出版工作中这些带倾向性的问题,作为党在桂林领导文化运动的主要负责人邵荃麟做了许多工作,他连续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1941年8月《文化杂志》创刊

---

① 邵荃麟在1943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生活》1卷5期,1942年1月15日桂林出版。

② 邵荃麟:《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



号)、《建立新的美学观点》(1941年7月《建设研究》五卷五期)、《1941年文艺运动的检讨》(1942年1月《文艺生活》一卷五期)、《向深处挖掘》(1942年1月《文化杂志》一卷六期)、《对当前文化界的若干感想》(1942年6月《文化杂志》二卷五期)、《重振抗战的文艺战线》(1943年《艺丛》创刊号)等评论文章,指出:“文化人对于自己的学术与创造必须认识其对社会的责任。”“勿为物欲所蔽”。<sup>①</sup>“文化是国民生活的反映,而同时也是改造国民精神生活的武器。”<sup>②</sup>“写一篇文章,编一本刊物,都是要对人对己负责的。一个艺术家是应该具有广阔的视野,写实的态度,严肃的生活,为真理为人类的殉道精神,总不会被那种……市侩主义所蒙昏。”<sup>③</sup>对文化市场和出版工作中的市侩主义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也对文化人和出版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连当时在桂的著名作家茅盾也大声呼吁:“我们对于文化市场,并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书在出,我们还须看所出的书质量怎样,还须看所出之书是否仅仅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抑或同时亦适合于文化发展上之需要。举个浅近的例,目前大后方对神仙剑侠色情的文学还有大量的需要,但这是读者的需要,可不是我们文化发展上的需要,所以倘把这两个需要比较起来,我们就不能太乐观,不能太自我陶醉于目前的热闹,我们还得痛切地下一番自我批判。”<sup>④</sup>

在文化市场上,当时也很明显,凡是党领导的书店、出版社以及杂志社,出版态度都是严肃的,出版物都是健康的,他们所出之书不仅仅是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更主要的是适合于文化发展上之需要。当时文化市场尽管也受到市侩主义的干扰,但桂林文化城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是以进步文化作为主要标志的,对文化市场中的市侩主义倾向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的。

---

①② 邵荃麟:《对于当前文化界的若干感想》。

③ 邵荃麟:《重振抗战的文艺战线》。

④ 茅盾:《雨天杂写之三》,1942年10月《人世间》创刊号,桂林出版。